

## 目 录

|                        |         |
|------------------------|---------|
| 对七七事变与宋哲元将军的片断回忆 ..... | 洪大中(1)  |
| 留欧回国抗战纪实 .....         | 贡沛诚(10) |
| 忆南口战役 .....            | 朱亚伯(18) |
| 回忆南口、居庸关抗日战斗片断 .....   | 吴建新(23) |
| 中国化学兵总队淞沪抗战侧记 .....    | 戴 威(26) |
| 中国海军抗战事迹 .....         | 郭秉衡(31) |
| 我所经历的抗战中的电话军事通讯 .....  | 王正元(38) |
| 国民政府两次迁都的片断回忆 .....    | 丁绍兰(54) |
| 回忆南京防卫作战 .....         | 程奎朗(58) |
| 南京保卫战及突围经过 .....       | 万式炯(74) |
| 周元将军殉国记 .....          | 梁家驹(81) |
| 第二军战防炮兵台儿庄抗敌纪实 .....   | 韩正礼(88) |
| 武汉保卫战前后的军委会战干一团 .....  | 程雪华(97) |

|                       |          |
|-----------------------|----------|
| 武汉会战大别山北麓战斗 .....     | 刘衍智(103) |
| 枣宜会战回忆 .....          | 过家芳(113) |
| 抗战初期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 .....   | 徐鸿恩(118) |
| 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出川抗战回忆 ..... | 骆周能(125) |
| 1942年缅甸作战回忆 .....     | 邓军林(144) |
| 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日纪实 .....     | 薛文涛(153) |
| 中国远征军攻克密支那之役 .....    | 周玉璞(168) |
| 滇缅公路龙陵战役 .....        | 欧阳午(180) |
| 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陷落前后 .....   | 周 尚(183) |
| 抗战中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 .....    | 卫立民(207) |
| 附录：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 .....  | 蔡德金(220) |

# 对七七事变与宋哲元将军的片断回忆

洪大中<sup>①</sup>

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至今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了。我当时在河北省宛平县任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事变后，王冷斋又介绍我到二十九军任宣传处中校处员。兹就记忆所及将事变前后及宋哲元将军的情况作一些片断回忆。

## 尊重上级 关心部下

宋哲元将军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日常庶政悉任下属处理。提倡“无为而治”。他幼年善事双亲，倍尽孝道，及长，虽高踞华北方面大员，仍克尽子节，不稍惶悚。他对长官尊敬爱戴，早年为冯玉祥将军部属，号称“五虎上将”之一，能征惯战，尽人皆知。但他对冯玉祥将军，不论他在台上台下，始终尊敬如一，无分厚薄。冯玉祥在泰山养晦读书及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蒋介石曾密令宋解除其武装，宋亦未执行，这是由于他心目中有西北军尊重老长官的传统。

宋哲元将军对部下的关怀爱护亦是人所共知。每年入冬前，他总要命令军需管理处查询所属官兵家属有无缺棉少被者，每年都要拨出专款解决冬季御寒所需。特别是对带兵的连级军官，每年发给三十元皮袄费，并给少校级军官的母亲每人发一段夏布料。宋

<sup>①</sup> 作者时任河北省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第二十九军宣传处处员。解放后曾任南京十中副校长，现已离休。

哲元带兵能深入基层，认识许多下级士兵并能喊出其姓名，常与士兵们拉家常，很熟悉士兵心理。宋哲元规定，每当一批新兵入伍，军师旅团长都要和新兵见面，做到官兵相识。

1933年3月，日军侵犯我长城各口，已占领喜峰口要塞前的两个阵地。为了消灭敌人，占领阵地，宋将军在部队中挑选了五百名敢死队员，从潘家口、董家口绕至敌后袭击敌人。敢死队中有个班长叫侯万山，行前他对宋将军说：“我的妻子即将分娩，如果我牺牲了，请将军能体恤孤儿寡母，我纵死阵前亦甘心了。”宋哲元叫军务人员将五百官兵的名字及要求一一记下，并作出安排。不久，侯妻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宋立将两遗孤接至家中请两名乳娘喂养，并以其父在喜峰口罗文峪牺牲之地名，为之取名为宋纪峰、宋纪峪。他还常嘱咐夫人常淑清，此乃烈士遗孤，要象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待孩子成人时还姓原宗。这件事对部队影响很大，大大增强了官兵们的抗日士气。

由于宋哲元将军对上对下忠厚仁慈，不做绝事，不伤人心，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全军官兵把爱国爱民付诸于实际行动，因而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宋哲元将军一生简朴，直至将军高位，从不挥霍浪费。他不吸烟不喝酒，喜欢吃小米干饭、三合面（玉米、小米、黄豆）窝窝头、小米粥，穿着从来都是一身布军服。但他对培养人才，兴办教育文化事业，却极为慷慨。在主政热河时，他曾捐款七十万元办教育；主政陕西时，他尽力保护了周秦汉唐历代文物古迹。

## 提倡尊孔读经以收拢人心

宋哲元将军虽出身行伍，但有礼贤下士之风。主政冀察时，他广延宾客，举凡名流学者，清末遗老，北洋政客，均兼收并蓄，一律待为上宾。其中既有贤达知名之士，亦有被社会唾弃之鸡鸣狗

盗之徒，宋无分良莠，每月均各送红包，使之各安所业，为己所用，不使敌伪增添更多羽翼。所费无多，但得益匪浅。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中央军和东北军相继撤出河北省，宪兵第三团以及河北省北平市各级党部、军分会政训处等亦均根据协定纷纷撤退，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以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时二十九军奉命进驻平津，接管河北防务。社会各方面初以二十九军乃喜峰口抗日杀敌之有功部队，何以为日方所接受部署冀察，于是对二十九军产生怀疑，一时谣言四起，莫衷一是。宋哲元对此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在调兵遣将部署以后，回过头来向社会各方面提倡尊孔读经，对社会上的扰扰攘攘不予理睬，其安静稳重态度，竟使谣言不辟自息。二十九军临危受命，主政冀察以后，对日外交从未屈服过。

关于尊孔读经，二十九军曾经大事宣传，阐明其意义，目的亦为安定社会人心。我曾于1936年春参加祀孔大典，典礼非常隆重，与会人一律长袍马褂，三跪九叩唱礼，配以古乐馨香，四六对称的骈体祀文，恍如进入梦境。我陪祀于颜子配殿，由于王冷斋不愿屈膝，我们就偷工减料地鞠了三个躬，赶忙走到大成殿去观礼。秦德纯却郑重其事地行三跪九叩礼，也许因为观礼的人多，他不敢象我们这样打折扣，但有两个陪祀的人搀他起伏，左右一挟掖，亦省了不少力气。祀孔大典搞了一个上午，北新桥一带，路为之塞。

宋哲元还自己出资发给二十九军连以上干部每人一套《四书》《五经》，并赠送给乐陵中小学及冀察各行政、教育单位人手一册，以求普及和宣扬孔孟道德理论，藉以收拢人心，迎合当时环境所需。以后，一些惧怕华北特殊化而准备南逃的人们逐渐安下心来，对二十九军由怀疑转向信任。

## 日军开入丰台

丰台位于北京城西南方向，过去归宛平县管辖，是京绥、京汉、京奉三条铁路交会的枢纽，地势极为重要。1935年，这里驻有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个营，随着察北、冀东相继沦为日军羽翼下的“自治区”，日军魔爪便逐步深入到华北各地，重镇丰台是其首先垂涎之地，控制了丰台就等于控制了北京。

1935年，日本以保护其驻北京大使馆为名，将驻扎在日本兵营的一个日军大队开往丰台，名为演习，实乃有计划有预谋的故意挑衅。日军在我军三十七师驻军营房前徘徊逗留，待我军收操返回营房时，日军故意阻挡我士兵行进，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日军利用双方冲突混乱之机，驱赶战马向我军营房大门冲闯，然后声言要将大队日军开进营房搜索军马；一面又由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向我冀察政委会和第二十九军提出所谓“抗议信”，指责我丰台驻军妨碍日中亲善友好，必须撤出丰台，并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谓日本军队有义务保护平津铁路线的安全，要求把丰台营房让给日军使用。当时二十九军刚从察哈尔进驻平津，人心尚未安定，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便接受了日方提出的要求，将三十七师的一个营撤出了丰台，日本天津驻屯军牟田口联队一木清直大队由此进驻了丰台。

当时丰台只有一条小街，宽度不足五米，路两旁全是矮小的平房，有些还是地窝子。街上没有什么商业，仅有几家卖香烟的杂货小店和几家小饭馆。街上招牌最多的是日本人和高丽人办的“料理”和“慰安所”两种，前者为吸毒所在地，后者乃日本妓院，因丰台驻军名为日军一个大队，实则河边旅团经常在龙王庙附近大规模演习，故丰台一带日本驻军在一千人以上。随营艺妓受丰台日军警察署管理。

## 坚守宛平城

“七七”事变爆发前，日军以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为藉口，向我宛平县城发动公开进攻，攻击部队亦即由丰台开来的日军一木清直大队。随后，整个河边正三旅团前来增援，攻陷我永定河东岸的龙王庙和平汉路铁桥。整个宛平城被日军打得百孔千疮，东、北两面城墙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城砖，特别是东面城墙被日军野炮近距离轰塌的扇形缺口达八丈多宽。宛平县政府大厅也被敌炮火轰塌。

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守城官兵冒着炮火，在缺口处奋勇阻击敌人爬城。我军迫击炮连官兵在日军炮击时，奋不顾身地扛着炮筒往城上跑，在城墙垛旁架起迫击炮向敌炮兵阵地轰击，迫使敌炮兵阵地从东沙岗向后撤退。因我宛平守军奉命只能守城，不能主动出城反击，故敌炮兵竟将野炮阵地设置在我步兵射程之内，使我军伤亡很大。

当日军炮轰东面城墙时，我守军习惯于躲避炮弹进入掩蔽部，敌则利用炮兵掩护的有利时机，派遣爆破组在我北城墙下埋下重磅炸药，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北城墙从上至下被炸开达两丈宽的缺口，城墙很大一段都被震裂，内墙仅有三分之一部分没有倒塌。等待在铁路路基两侧的日军随着炸药烟雾向城里猛冲，我军官兵纷纷从城墙上跳下缺口，与敌人进行白刃战。一场肉搏之后，敌人无一生还。最后，我军以一连人牺牲的代价，才稳定了宛平城防。

## 增援卢沟桥

日军在7月7日突然袭击我宛平县城的同时，亦向我永定河

东岸龙王庙守军发起进攻。当时这一带广阔的平原，正是日军经常进行野战演习的地方，故对地形特别熟。我守军仓促应战，不幸全部牺牲。日军占领了龙王庙，控制了平汉路铁桥，并利用铁桥作掩护，于7日夜间派遣一小股部队，从铁桥北下到河滩，凭藉河床上半人高的野草掩护，徒步涉水到达永定河西岸，深入到长辛店站的扬旗下，始被我军哨兵发觉，一阵排枪打过去，敌人倒下十多人，仅有一人侥幸逃回。

日军侦知实情后，立即派出一个大队约四五百人，仍循原路向长辛店进犯，试图切断卢沟桥和宛平城守军的退路。在此危急关头，我长辛店守军已作好准备，并派遣一个重机枪连支援二一九团防守卢沟桥。该连到达卢沟桥后，即在桥上架起重机枪向永定河上半渡之敌进行猛烈扫射，敌人见我有准备，遂仓皇撤退。永定河滩上遗有敌尸多具。自此，日军未敢再行强渡永定河。

## 日军一再增兵 战事日益扩大

7月7日深夜，战况正在紧张之时，日军割断了宛平通北平的电话线，前线战况无法传递到北平。在此危急时刻，我侦查得知宛平与丰台尚能正常通话，而丰台与北平能够接通。于是，我连夜潜赴丰台。丰台总机人员得知我为传递卢沟桥战况而来，立即为我提供方便，给我两条线路作为专线之用。我迅即接通了宛平与北平的电话，汇报了战况。8日，我军在何基沣率领下，出击反攻，收复了龙王庙和平汉路铁桥。

7月9日，中日双方举行了谈判。日方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双方商定，宛平城改由保安队接防，日方指定由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三百人接二一九团城防。但秦德纯在北平用电话要我命令吉星文，不但不能撤至永定河西，而且还要加强城防守备。

9日下午，日军企图利用保安队力量薄弱向我宛平城再次进攻，遭我守军痛击后始未敢再犯。当时我仍住在丰台商会，地点正好面对丰台火车站。因车站由日本宪兵和日本警察署武装封锁，中国人不能自由出入，但我的住处却能把车站看得很清楚。8、9两日，日本军用列车不断由关外到达丰台，运来大量兵员和武器装备，这分明是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我把这些情况用电话向二十九军上层领导作了汇报，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秦德纯认为，日本军部进攻的命令尚未下达，因此我方应执行双方达成的协议。10日，双方在北平举行谈判，我也在场。我方向日方尖锐地提出了日军调兵遣将，毫无谈判诚意的行为。日方代表无言以对，在休会时悄悄溜走。

正当宛平作战激烈之时，宋哲元将军仍在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进行谈判，并撤消北平各城门的防御配备，但唯独没下达卢沟桥停战的命令，并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调三十七师撤退至长辛店以南，撤换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等条款；同时命令何基沣一一〇旅严守阵地不准后退一步。

以后，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事日益扩大。7月27日，二十九军下令全线反击，何基沣一一〇旅曾收复丰台，但因三十八师董升堂旅未能及时赶到增援，以及南苑等地战况发生变化，何旅不得不撤回卢沟桥原防。

### 撤离宛平城转赴各地

1937年7月28日，局势突起变化，南苑、黄村、廊坊等地在日军陆空军的猛烈攻击下相继失守，宋哲元乃下令部队撤出平津，分别向保定和静海转移。宋本人率同秦德纯等少数幕僚于28日夜离开北平，经门头沟、长辛店而至保定。宛平守军于宋等人撤退后，亦于29日拂晓前悄悄转移。至7月29日，宛平城已无兵力防

守，由万福麟部队(东北军五十三军)在涿州布防。

我于29日部队撤离后撤出宛平，在路上徒步行军三天才到达保定，住在南关曹家花园(即曹锟的花园)，与宋哲元将军居所门户相对。翌晨起床后，在园中与宋将军不期而遇。宋一身戎装，灰布军服，布绑腿，面带倦容，两颊消瘦，嘴角下垂。一望而知其疲劳过度，似已数夜未眠。跟随左右的有秦绍文<sup>①</sup>、雷嗣尚、邓哲熙等五六人，唯独无一武将。只见张樾亭出出进进，略显匆忙，看来，宋哲元当时的首要问题已由军事转为政治。雷嗣尚先起草了电文，向蒋介石报告了二十九军从平津撤退的经过；接着宋哲元又派秦绍文赴南京，最后，经蒋介石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原三十八师、一四三师、三十七师分别扩为五十九军、六十八军、七十七军。整个扩编工作，在不足二个星期内于保定完成。

在此期间，部队亦陆续集结完毕，奉命由平汉线移至津浦线，归冯玉祥将军领导的第三战区长官部指挥。行前，宋将军特向指挥平汉线的第一战区长官刘峙辞行。

我们在保定南门外乘五条大木船，经河间向泊头镇进发。沿途洪水泛滥，平汉线至津浦线一带汪洋一片，整个河北省中部陷入白浪涛涛的灾难之中。前线士兵们半截身子泡在水里，子弹袋挂在脖子上射击敌人，但敌人有橡皮艇，有飞机，我军在汪洋中毫无隐身之术，故作战艰苦，困难备尝，远非后方人们所能想象。河北省中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的原因即在此，盖无法施展陆军的作战能力。

我们在泊头镇小住数日后即移节桑园，旋奉命至济南办《小实报》，以解释撤出平津经过和为张自忠将军洗雪社会误解的不白之冤。宋将军批给了三千元河北票，我就在济南普利门大街开办了《小实报》编辑部和发行部。日军渡河前，我又转移至开封，继而

---

<sup>①</sup> 秦德纯字绍文。

又到西安。

从我负责辗转运到陕西蔡家坡的二十九军修械所的大锅炉及一切机器设备(实际是一个兵工厂,都是宋哲元在冀察平津时以截留的海关税、盐税等向捷克和德国购买的)来看,宋哲元是有心机有准备的,不然这些庞然大物何以能在仓卒之间拆卸得及,更不要说装车运走。这些事实说明宋哲元将军是抗日爱国的。

宋哲元将军在撤出平津后,曾要我在报纸上向后方新闻界宣传张自忠将军留在北平是他委派的,责任应由他承担。后宋哲元将军在绵阳死后,张自忠曾亲写挽词,表示不愿独生。一月之后,张自忠在南瓜店为国捐躯。事后据幸存者说,当时张将军完全有条件撤过汉水,但他除将俄国顾问和身边幕僚打发回河西外,自己却亲率特务营与日军拚杀,看来其早有必死之心矣!宋哲元与张自忠的关系实非一般长官部属所可比拟,真乃莫逆之交也。

# 留欧回国抗战纪实

贡沛诚<sup>①</sup>

## 从柏林到东北

1931年，在德国犹太人办的《柏林日报》上刊登了“九一八”事变的惊人消息：“奉军退往关内，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地席卷中东路以南的广大河山。”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为祖国命运而牵肠挂肚。同年冬，《柏林日报》又将马长山（当时把“占”译成了“长”）在江桥阻击日军北犯，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的消息赫然刊出，在柏林的华人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当时，我正在柏林大学读书，并担任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我与当时的国民党驻德支部成员欧阳格、肖铮、罗霞天等人频繁磋商，大家对“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作抵抗即进入关内一事迷惑不解，对马占山的江桥抗日则十分振奋，把他看成了民族英雄，一致认为有必要派人取道苏联回到东北去见一见马占山，向他表示留德中国学生的敬意，必要时联合在欧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胞进行声援和募捐，支援马占山抗日。

远在1925年8月至1926年2月间，我曾受中国国民党北平执行部负责人于右任、丁惟芬、李大钊和国民二军的刘守中、史可轩的共同派遣，带着秘密文件（用白绫代纸）前往东北会见在延边一

---

<sup>①</sup> 作者时为中国留德学生。1986年去世前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带从事复国运动的韩国独立军总司令金云峰，目的是要他参加国民党和关内国民军联郭(松龄)倒张(作霖)活动。我到牡丹江(现牡丹江市)南二十里许的朝鲜村落里和金云峰谈了五个昼夜，遂结成倒张反日同志。另外我还结交了“东山里”(当时社会上的通称)的仁义军(原由吴佩孚命名的反张作霖的民间武力)。由于上述原因，支部决定派我回国，取道西伯利亚，这样可在莫斯科拜访莫德惠大使，对东北的局势求得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征求他的意见。嗣由支部电告莫斯科大使馆，请予接待。

1932年2月，我满怀热情地从柏林出发，乘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谒见了莫德惠大使，他中等身材，操浓重的东北口音，言谈清晰。我激动地陈述了回国的原委和今后的打算。莫大使对我说：我们东北部队奉中央命令入关，现在分驻于吉黑两省沿中东路一线南北的各旅苦于“群龙无首”，前途难于乐观；留德学生的爱国热情，我非常钦佩，贡先生径往黑省海伦北安地区踵访马占山旅长，有益于该旅士气。逗留莫斯科期间，我曾率直地向莫德惠大使提出，以往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第一个取消了帝俄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提出互设大使馆于各自首都，帮助孙中山进行中国革命，现在强大的苏联是正在危难之际的中国的最可靠友邦。但莫大使仅谈到斯大林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犯中国东北的强盗行径态度鲜明，就不愿再深谈下去了。

离开莫斯科、进入国境后，我在昂昂溪下车，即赴海伦马占山司令部。见到马时，我首先郑重道及他江桥抗战的壮举已在国外报纸上登载，影响不小，留德学生非常振奋，我代表驻德国民党直属支部，也代表留德学生向他致敬。他朴素而爽快地说：我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打了日本鬼子一下。接着我就把直属支部准备积极联系全欧留学生和侨胞募捐支援马将军抗日的设想陈述一番。他说，目前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很难说。日军武器精良，补给充裕。我们留下来的队伍东一股、西一支地分散在中东路以北的

吉黑偏北地区。马之所言，大旨与莫大使所谈类似。一则因为缺乏实力，二则由于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对我只身一人来访，兴趣不浓。而我对马的印象是精神不振，身材瘦弱，又有鸦片嗜好；且只率一旅之师，藏身于海伦、北安一隅。这一现实情势与留德同志们想象中的民族英雄存在着相当距离。

离开海伦后，我照原定计划转向满洲里访晤镇守使苏炳文，力求多了解一些情况。路过拜泉，与驻该县的旅长范崇谷握晤。范身躯壮健，精力充沛，且健谈。马、范二旅虽然相距甚近，但彼此间缺乏同赴国难的气氛。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拜访苏镇守使，他的态度与谈锋实质上与马、范二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一言以蔽之：“留学生有多大实力？”

斯时，只有东去哈尔滨中国大街《晨光报》社寻访旧友张树屏。张任该报主笔，张向我分析了当前东北敌我形势，说哈尔滨的镇守使丁超、伊兰的李杜都是徘徊歧途，无抗日决心。好在受尽日本军宪残害、志愿保家卫国的东北人民毕竟占绝大多数。接着他十分懊恼惋惜地告诉我：你结交的倒张抗日好友金云峰将军不幸被暗杀身亡。这一消息使我心痛如割，在柏林支部的设想，到此几乎全部落空。

张转过话头说，他现任哈埠国民党组织部长，组织部干事关耀洲同志集合双城县子弟组成了抗日武装。关是世居双城的旗人，有一定声望。党部对关寄予很大希望，还望我前去那里看看实际情况。

后来，张和我由关陪同到双城西乡，检阅了他所统率的三个中队。其中大多数兵员是当地人，也夹杂着若干“兵油子”。关和他的参谋长恳求我短期帮助他们的整训教育工作，给我主任参谋的名义。张树屏也要我在当地暂留一两个月。哪里知道在第一个月底，关同志率队大摇大摆地开向预先约好的“大粮户”取粮时，中了该地主和双城县伪军事先安排好的圈套。关同志在寨内和地

主打交道不到半小时，在寨外的杨参谋长和我以及队长们忽然发现一股服装整齐的骑兵向这个寨子运动，杨立刻派人入寨告知关耀洲，同时控制进出的寨门，就地部署各队依托地形地物，准备阻击。顷刻之间，来敌号声一响，寨内隐藏的地主武装应声开火，迫击炮也猛射过来。在此紧急当儿，为保存实力，杨与我率少数干员殿后，掩护各队主力向远处“草甸子”（当地人对泥藻地的通称，仅容单人通过，骑兵无能为力）转进，循草甸边缘选择有利地势，稳住阵脚，与敌周旋。在摆脱敌威胁的行动中，散乱的地主武装尾随追击，殿后的三十余人居高临下，击退了来敌。

夜幕降临后，集合整队，队长们引导大家宿营。深夜，村民告发队伍中有抢劫民财事，参谋长和三个队长仅责令有关人员交还财物，未予以严厉惩治。目睹这种歪风邪气，想到关同志又被困寨内，凶多吉少，我感到已无法继续呆下去，遂告别杨等三人而回哈埠。经与张树屏详话经过，我萌发出自己搞抗日武装的心愿，以回报驻德直属支部同志们的委派。

在哈市我找到了该埠交通银行行长谢荫昌（曾任辽宁教育厅长，与我是常州同学），他办了一件前去北平交通银行接洽业务的公函给我，我凭此通过了日本宪兵的检查关口——长春、大连。在大连登上轮船出海以后，内心的紧张情绪方才松弛下来。

在北平，刘守中的秘书段泽青介绍我和徐靖运（安东人，辽宁讲武堂毕业）见面。“九一八”后，徐就在抚宁、都山、迁安、遵化、喜峰口一带从事抗日宣传和联络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我认为该地区确是发展抗日武装的地方，因此决心向南京方面汇报，争取资助。

## 蒋介石两次召见

当我离开柏林前，驻德直属支部已将我回国的原委呈报中央

组织部，同时由肖铮、罗霞天函告了陈果夫。1932年4月，我取道津浦线到达南京，谒见陈果夫，汇报了离德回国的原因以及面见莫大使、海伦晤叙马占山、哈尔滨市党部张树屏、关耀洲两同志在双城组织抗日武装等详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果夫，他对我的汇报也乐听喜问。我说，北京爱国人士年来在滦河流域的长城南北进行宣传活动，抗日武装已初具规模，加以有许多东北青年集中在北平，是一支重要的后备力量，在那里进行抗日的地利、人和条件已具备，独缺经济支援。陈颇为动容。一周后，陈果夫亲临我处通知，彼已将我的实情向蒋委员长面报，委座特意召见。

隔了几天，陈果夫带我去小营的委员长办公室，我把向陈果夫汇报的内容向蒋重复了一遍。他表示愿意帮助，就匆匆结束了这次谈话。后来蒋介石从武昌行营打电报给陈，通知我去武汉面见。陈叫肖铮（此时肖已从德回国，担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院长）陪我一同去武汉见蒋。蒋手批了三万元经费，并说已通知邓文仪派三人助我。辞别后在东返途中闲聊时，我说：“委员长现在就派人相助，未免为时过早。”肖直率地说：“到处要安排人，是委员长的一贯做法。”

回到南京，首访邓文仪。邓递给我选派的三人名单，全是黄埔生。因邓是奉命而行，使我无启口余地，心中着实纳闷。这三个人是陕西人张德荣，另外两个都姓王，同是湖南人，我只记得一个叫王开石。接着到军需处接洽，方知三万元经费要分三批拨发，每两个月拨发一万元，我即托肖铮代领转寄。

与我一同北上的还有我早在东京结交的三位东北籍士官生，炮科的吴佩明，步科的曹瑞麟，辎重科的蔡某人（后来成为陆军中唯一的辎重师师长）。那时他们都是南京中央军校的教官，主动请长假北上，和我合力创建义勇军，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是我去汉口见蒋前已击掌预约的人地两宜的抗日的伙伴。

## 汤道河树帜

1932年夏，我们一行七人到达天津，徐靖远如约与我们会面。经反复商讨，决定在汤道河建立抗日武装据点。汤道河位于河北都山之北、热河以南，就小范围而言，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出汤道河，皆要淌过一二条溪流，此处不仅地理条件好，而且只有一个王姓的大地主和少数佃农户，初步取给的粮食就在咫尺。我们在天津买了四支德制二十响驳壳枪，取道滦县、冷口直达汤道河。

我们在汤道河树起了“民众抗日铁血团”的旗帜，我任团长，徐靖远任参谋长，下编三个队，第一队队长吴佩明，第二队队长王开石，第三队队长王××，曹瑞麟、张德荣任参议，团员有二百许，大多数是东北流亡青年。我们共同议定，不论职位，一律每月拾元饷给。随后，不断有来自河北、江浙各地的青年参加。

本团的办公室、营房均为寨主王老爹所提供。王老年届七十四五，体格魁梧，能驭烈马，且秉性豪爽，言信行果，相处仅两个月，他主动赠送四十多支杂枪，为铁血团增色不少。

我们训练团员的目标，是在半年期内要求每一团员能教练和指挥一个班对敌作战，所以操场侧重练体力，野外侧重如何利用地形与地物，加强模拟战和对抗战，不时举行旅次行军与夜行军宿营。讲堂的精神讲话教授近百年史，着重于祖国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蚕食的国耻。经济上除尽力节省外，同时向北平“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求助。通过该会财务科长孙敬斋（我在国立南京东南大学的同学，江苏涟水人）介绍，拜会了会长朱庆澜先生。朱曾于清末民初先后担任过东北和广东的封疆大吏，如今虽已白发苍苍，但相貌伟岸，精神饱满，诚恳热情，一席畅谈后，食粮成品就不时经古北口、承德运来本团部。